

# “经典之争”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实践探究

黄峰

(泰山学院 文传学院 山东泰安 271000)

**摘要:** 高校外国文学专业教学实践中,面临着讲授何种经典文本的困境,正如《哈利·波特》是否具有和《哈姆雷特》同样的教学价值。面对这一困境,外国文学专业教学并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应深入地分析“何为经典”。在面对“经典之争”时,高校外国文学专业教学应采取通变式教学策略,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将原有的经典文本范围扩大。这样一来,既可扩大课堂教学的实际内容,也可更好地增加外国文学专业教学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学生深入学习。

**关键词:** “经典之争”; 外国文学专业教学; 敞开经典

**中图分类号:** G642.0

受到现代市场经济以及传播媒介的影响,我国高校外国文学专业一直深受“经典之争”的困扰,也即:当下大学生课下阅读的文本对象与外国文学专业课堂上的教学对象并不统一。学生们课下阅读的作品往往是当下流行的畅销作品,而这样的“网红作品”却是课上教学基本不涉及的教學对象;相反,传统的、经典的外国文学著作,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的小说,受到普遍的冷遇。由此或可看出,高校外国文学专业教学过程中,如何应对教学对象的“经典之争”,是该专业教学实践中必须予以正视的问题。

## 一、“哈利·波特”与“哈姆雷特”之争

以外国文学作品为例,畅销的文学作品更易于引起广大学生的普遍关注,这从网上各式的推荐书单中就可窥端倪。比如英国女作家J·K·罗琳(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系列、美国作家乔治·马丁(George R.R. Martin)的《冰与火之歌》以及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Yann Martel)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畅销文本。高校学生如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对这些畅销书如数家珍,主动会阅读它们的英文原版。

站在文学研究的视角看,《哈利·波特》系列畅销文本自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往往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富有想象力。但从阅读时间及个人精力上看,《哈利·波特》等畅销文本阅读多了,对《哈姆雷特》等经典文本的阅读相对就会减少。在高校外国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发现,不仅是理工科的学生,就连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对教材指定的经典作家及文本也缺少应有的阅读。《哈利·波特》与《哈姆雷特》作为诞生时代相距甚远的两部文学作品,本没有直接的关联,所谓的“经典之争”完全来自于教学内容选择上。在面对学生们渴望了解“哈利·波特”时,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却一直秉承讲解“哈姆雷特”等经典的固定模式,这样自然引起这两类文本之间的“阅读-教学冲突”,我们可形象地称之为“经典之争”。

市场经济、舆论导向、影视翻拍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并不能成为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实践可以推卸责任的唯一原因。任何问题的出现,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仅归结于外因的影响,反而是对自身不足的一种回避。具体来看,以下三方面的原因或对“经典之争”的出现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一,教材内容的滞后性。目前高校外国文学专业教学中,常见教材偏向于通识性介绍,更多是考虑到对不同层次学校及学生的兼顾。这类通识性教材,主要是以对欧美文学、东方文学的概述为主要编写内容,侧重于文学史体系的建立,在具有整体性、通识性、易于讲授等优点的同时,也具有忽视当下畅销文本的不足之处。因此,外国文学教材本身存在着与当下文学创作、传播及阅读脱节的

不足,尚不能在课堂教学上做到与时俱进。

其二,教学范例的局限性。某种程度上,外国文学史简约为对经典名著的介绍与分析。比如涉及18世纪欧洲文学时,课堂教学多围绕法国启蒙四大家以及德国的歌德为主,但从二十世纪开始获得市场关注的小说《项狄传》亦是18世纪的作品,却在我国目前常见的外国文学教材中基本没有涉及。这就造成学生虽对《项狄传》之类的著作充满好奇,却无法在课堂上获取详细介绍的现象。

其三,教师视野的局限性。外国文学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自己的研究方向靠拢,在熟悉的领域有着充分的讲解,而在学生们感兴趣而自己不太熟悉的作家、作品上没有足够的介绍。比如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特别容易引起文科生的阅读兴趣,但就很多只熟悉欧美经典文学的教师而言,往往处在对这类后起作家不甚了解的尴尬境地中。

基于以上内在原因,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本身确实存在不足,不能很好的满足学生们对课堂教学的认知期待,无法避免“哈利·波特”对“哈姆雷特”的教学冲击。对此,外国文学专业教师要做的不是指责市场经济等外在因素对教学的影响,而应从教学本身的内在不足入手,正视问题的存在,通过不断的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以避免机械教条的模式化教学。

## 二、“经典”的确定与敞开

在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所有经典作家中的核心,“已成为所有作家的试金石”<sup>[163]</sup>。而《哈姆雷特》作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首,其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经典地位,更是毋庸置疑。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恰恰反映了这部悲剧所具有的超时空魅力,仅在中国就有十余版汉语译本。因此,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将《哈姆雷特》等作品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本身并没有问题。就此而论,“哈利·波特”对“哈姆雷特”冲击之要点,不在于“哈姆雷特”等经典值不值得讲授,而在于“哈利·波特”等文本可否视为“经典”。

在古代汉语中,“经”与“典”最初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指河川在地面上的脉象或纹路,后者则指有关帝王的记录。汉魏时期才出现“经典”一词,代指反映儒家思想的文化典籍,唐宋时期的“经典”进一步将佛教典籍涵盖其中。“经典”就这样在漫长的文化发展中,逐渐具有现代汉语中的通用含义。在西方语言史中,“经典”有两个对应的说法,其一是 canon,它最初源于希腊语,本是指用于度量的工具,在纪元前后被用于宗教领域,成为指称《圣经》等相关宗教书籍的专门用词;其二是 classic,最初源于拉丁语,本是指用于区分税收等级的专有词汇,后成为区分作家、作品水平高低的词汇,并在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时期,成为代指古希腊时期优

秀作家及作品的统称。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之后，依然值得推崇的书籍可被称为“经典”。可见，中西方文化对“经典”一词的使用，都在于强调某些书籍具有超越时间的恒久价值。只有那些“由优秀作家创作、得到学术界认可、并能够构成某种文学传统的精品”<sup>[29]</sup>，才能被视为文学界的经典。

可见，《哈姆雷特》等文本能够被视为“经典”进入高校课堂，乃是历经时代变迁、学界认可后的结果，自身所具有的“经典性”（canonicity）是它们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纷争、备受不同时代读者喜欢的文学根源<sup>[30]</sup>。作为对照，《哈利·波特》等畅销文本很明显并不符合“经典”的基本要求。首先，在时间维度上，畅销文本不可能经历过不同时期的反复诵读，能不能长久的获得后世读者的持久肯定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真正成为经典需要经历起码一个世纪的时间考验”<sup>[31]</sup>；其次，这些畅销文本的作者都是现当代作家，有些人的创作实践还在进行当中，故而学界对他们创作整体的研究也只能是处在初始阶段，无法像对前代作家那样进行全面的系统分析。由此看来，高校外国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确实是时代、民族、社会、学界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确实不可能将当下的作家及畅销文本立即转化为课堂上的教学对象。

但是，有关“经典”或“经典性”的界定一定是绝对的权威吗？它们是甄别所有文本的唯一标准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西方文论界兴起了解构主义大潮，学界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重估一切传统的东西，这其中也包括“经典”在内。美国学者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和休斯顿·贝克尔（Houston Baker）编辑出版了《英语文学：打开经典》（*English Literature: Opening Up the Canon*, 1981）。从书名就可看出，“经典”并不是确定的，而是敞开的，召唤着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对其进行探究。大文论家 M.H.艾布拉姆斯亦认为“打开经典（to open the canon）可以让经典更富有多元文化性，而非仅以欧洲中心为标准”<sup>[32]</sup>。很明显，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有关经典的本质主义观只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sup>[33]</sup>，只会严重地束缚文学批评实践以及课堂教学实践的开展。

简言之，任何将“经典”（教学内容）固定化、模式化的行为，都只是固守本质主义思维的短视行为，必然会导致文学研究的僵化以及教学质量的退步。在多元文化交流频繁的当下社会，我们更应将“经典”视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话语建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固定标签。“哈姆雷特”可以成为高校外国文学专业教学的重点，诸如“哈利·波特”等畅销文本亦可以通过具体研究而转化为教学内容。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隔阂，更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高低之分。

### 三、“经典之争”下的通变式教学

在“打开经典”的多元文化背景下，《哈利·波特》等畅销文本有被课堂教学接纳的必要。但在现有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如果生硬的添加或讲授畅销文本，则不仅不会顺利地嵌入教学体系中，反而会造成文学史的散乱甚至断裂。因此，如何将传统的经典文本讲授与当下的畅销文本分析相结合，也即在认识“哈姆雷特”时，如何欢迎“哈利·波特”，就成了缓解“经典之争”的关键。这是颇为两难的教学问题，却也是充满趣味的教学挑战。

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论及：“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趁机无法。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刘勰对文学发展的看法，在于强调继承古人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对创新的强调。由此而来，“通变”说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的重要命题。以此“通变”论思之，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在面对“哈利·波特”与“哈姆雷特”的“经典之争”时，亦可采用“通变”的思维方式对传统课堂教学进行变革，摒弃传统的模式化、教条化讲授方式，以适应新时代的认知期待。

首次，积极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及方法。“经典之争”的背后是二元化的划分模式，即传统教学开始之前就已然对文化进行了区分，将经典文本置于高于非经典文本的地位。很明显，这种人为区分的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20世纪中叶作为独立学科出现的比较文学则为传统文学教学过于僵硬的划分带来生机，拓展出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等新的研究领域，为不同文本之间的平行研究提供了途径。

其二，鼓励基于多学科视野进行主题拓展和文本解读。传统教学更多停留于教材的层面，而忽视了从教材出发，进行拓展教学的可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有时需要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结合宗教、哲学、心理学甚至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加深对文本的解读。这种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教学模式，既有利于对文本意义的深究，也有利于将一些非经典文本列入经典的考察范围。

其三，毕业论文撰写可以尝试多元化的研究对象。毕业论文的写作是课堂教学的必要延续和有益补充，考虑到有关畅销文本的教学一时还无法完全铺展开，可以尝试在毕业论文选题方面的多元化引导。就以往实践而言，很多本科学生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设计上，确实更愿意依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阅读情况来选择研究对象，而不再停留于对教材中经典文本的传统分析。这既可以视为是对传统教学内容的丰富与突破，也可以视为是对教学内容“经典之争”的一种与时俱进式回应。

法无定法，通变式教学只是一种宽泛的代指，并没有确切的措施可以保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做到绝对的与时俱进。以上方法、思维或视角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面对“经典之争”的包容态度，一种基于丰富教学内容的多元化策略，而不是计较究竟哪些文本应该被列为经典。面对“经典之争”，任何新颖、多元的“打开经典”方式（the opening-up of the canon）只要有益于教学质量的提升，都可以在实践中予以采用。

### 小结

对于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实践而言，调整经典文本的讲授本身并不是坏事，不断涌现新的有文学价值的文本，正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活力所在。面对“经典之争”时，改善的关键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教师自身学识素养的提高与教学观念的改进，是一体两面的，不能只强调学识的积累，而忽视对教学观念的改进。只有明白教学本身不仅是一种输出，也是一种输入时，教师才能从僵化的观念中摆脱出来，用更包容的态度来处理“经典之争”。

### 参考文献：

- [1]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2]赵一凡主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3]刘象愚. 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 中国比较文学. 2006(2): 44-58.
  - [4]Donald Greene ed., Samuel Johns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5]M.H.Abrams and Geoffrey Galt Harpham.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oston: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8.
  - [6]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作者简介: 黄峰, 1982年人, 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
- 基金项目: 2020年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十九世纪德国文学转向下的E.T.A.霍夫曼创伤书写研究”(20CWWJ07)阶段性成果